

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场域困境与路径优化

唐辅城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日

摘要

新时代道德建设立足社会生产关系变革与数字化发展大势, 面临传统道德范式适配不足、网络道德失范、科技伦理风险凸显等现实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方法论基础,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 聚焦新媒体传播、科技创新两大新时代核心场域, 系统剖析当前道德建设的现实困境与深层成因, 探索适配数字时代的道德建设创新路径, 致力于新时代社会道德体系建构与文明素养提升。

关键词

新时代, 道德建设, 科技伦理, 媒体道德, 道德治理

The Dilemmas and Optimisation Paths of Mo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Fucheng Ta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26, 2026; accepted: August 1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 2026

Abstract

It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inadequacy of traditional moral models, online moral misconduct, and prominent technological ethical risks, all within the trends of changing social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digit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Marxist moral theory as a methodological basis and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s a value guide, focusing on two core new era fields: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systematically analyse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of moral construction and their deep-rooted causes, exploring innovative paths for moral construction suited to the digital age, aiming to build a social moral system and enhance civilised literac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New Era, Moral Construction, Technological Ethics, Media Ethics, Moral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新时代以来，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与数字技术的全面渗透，使道德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由于市场经济规则、政策法规、社会治理还不够健全，受不良思想文化侵蚀和网络有害信息影响，道德领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¹。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双重理论支撑，聚焦新媒体、科技创新两大道德失范高发场域，结合现实问题与具体案例剖析困境成因，探索适配数字时代的道德建设创新路径，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与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2. 新时代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核心要义在于：道德并非超历史的抽象原则，而是特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其精神生产，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1]。这一原理为我们理解当下道德困境提供了根本方法：当社会生产方式从工业经济转向数字经济，从线下实体转向线上线下融合时，道德规范也必然经历深刻的迭代。

传统中国社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为基础，道德规范主要通过宗族家训、乡约民规、舆论褒贬来维系。个体的道德行为处于持续的社会注视之下，“面子”“口碑”构成了强有力的约束机制。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城镇化进程，特别是近二十年数字技术的爆发式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时空结构。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虚拟性使得传统的“熟人监督”几乎失效，而新的、适配数字生活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成熟定型。这种新旧交替之间的“规范真空”，正是当前诸多道德失范现象的深层根源。同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2]。这一性质决定了新时代道德建设不能简单沿袭传统道德教化的路径，也不能盲目照搬西方自由主义伦理学的框架，而必须在坚持人民立场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回应数字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因此，从场域视角切入，分析不同场域中道德规范的形成、失效与重构机制，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当代的具体运用。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核心价值坐标与精神支柱，是国家立足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凝练的核心价值体系，兼具坚实的政策权威性与深厚的学理支撑，为道德建设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价值引领与实践遵循。

其“国家 - 社会 - 个人”三位一体的价值架构，层层递进、相互赋能，构建了覆盖宏观治理、中观社会、微观个体的完整道德价值体系，彻底解决了新时代道德建设价值导向模糊、行为标准缺失、建设

¹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449646.htm

方向散乱的核心问题。在宏观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界定了新时代国家发展的精神底色,明确道德建设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方向,将道德建设上升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工程;在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理念,划定了新时代社会运行、公共交往、行业发展的基本道德准则,为媒体传播、科技创新、市场经营等社会领域的道德治理提供了核心依据;在微观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价值准则,细化为普通公民的日常道德规范,为个体言行举止、社会交往、职业实践提供了可感知、可践行的道德标杆。在实践落地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抽象的价值理念,而是具备完整落地体系的实践准则。学界研究表明,核心价值观可通过文化渗透、制度嵌入、法治保障、教育引导、舆论赋能多元路径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3]。因此,必须将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法治建设、社会治理、校园教育与日常生活,以法治刚性保障道德践行,以道德教化滋养法治精神,为新时代道德建设提供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

3. 新时代道德建设的核心场域与现实困境

新时代道德建设的核心特征是场域迭代与问题更新,传统线下生活场景的道德问题逐步弱化,数字化、科技化、网络化催生的新型道德矛盾成为治理重点。其中,新媒体传播场域与科技创新场域作为新时代社会活动最活跃、公众参与度最高、技术迭代最快的两大核心场域,也是道德失范频发、伦理冲突集中、治理体系滞后的关键领域。因此,精准梳理两大核心场域的现实乱象,总结新时代道德建设的普遍性短板,是剖析道德建设困境、创新实践路径的重要前提。

(一) 新媒体场域: 流量逻辑下的道德失序

新媒体以其去中心化、即时传播、全员参与的特性,彻底改变了信息生产与消费的格局。然而,商业资本的深度介入使得“流量至上”成为平台运营的核心逻辑,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道德失范问题。

第一,价值出现偏移,从传统的内容为主向流量为王转变。在算法推荐的驱动下,部分平台和自媒体将点击率、转发量作为唯一评价指标,刻意制造情绪化、极端化内容以博取关注。例如,现在为博取流量,许多平台只关注热点,许多短视频账号在事实尚未查明的情况下,便发布带有强烈倾向的“定性”内容,易对大众产生误导。这种“流量优先于真相”的做法,不仅严重侵犯当事人权益,更在潜移默化中扭曲了公众的价值判断,当“爆款”成为唯一标准,理性、客观、善意这些传统新闻伦理的核心要素便被边缘化[4]。

第二,匿名环境下导致道德感一定程度降低。网络空间的低门槛和匿名性,使得造谣传谣、人身攻击、隐私泄露等失信行为几乎零成本发生。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六成的网民曾遭遇过网络虚假信息,近3成的网民表示曾无意中传播过谣言[5]。当虚假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触达千万用户,而辟谣的成本和周期远远高于造谣时,社会信任体系便面临系统性风险。

第三,传播效能出现一定衰减,传统道德宣传教育依赖官方媒体的单向灌输,这种方式在新媒体环境中遭遇严重的水土不服。年轻一代习惯于碎片化、场景化、互动化的信息接收方式,对生硬的口号式宣传往往产生抵触心理。许多官方账号虽然开通了短视频平台,但内容形式陈旧、话语体系僵化,难以真正走进青年群体的内心世界。

(二) 科技领域伦理道德风险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基因技术、合成生物等前沿科技的飞速迭代,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提升了社会发展质量,但同时也突破了传统社会形成的伦理道德边界,催生大量无现有规范可依的新型道德困境,科技伦理治理已然成为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前沿核心议题[6]。

第一,算法歧视与隐私侵权大数据和算法推荐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显著的便利,但也滋生了新型不公。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大数据杀熟”现象,北京消协通过问卷调查、舆情采集和

体验调查 3 种方式研究“大数据杀熟”问题,结果显示,88.32%的被调查者认为“大数据杀熟”现象很普遍,其中 56.92%的被调查者表示有过“大数据杀熟”的经历[7]。“大数据杀熟”是电商平台(主要是互联网平台)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大数据技术,对依赖该平台较为忠诚的用户进行不当利益宰割,从而使大数据技术成为部分经营者追求超额利润的有力工具,使得不同消费者在进行同一消费时出现显著的价格差异[8]。这种行为表面上是商业策略,实质上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侵犯,违背了“公正”这一基本道德原则。此外,平台过度收集用户信息、甚至未经授权向第三方出售数据的事件屡见不鲜,用户的隐私安全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

第二,生物科技的生命伦理挑战。在生物科技领域,基因编辑、辅助生殖、人体胚胎实验、器官移植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攻克疑难疾病、保障生命健康的同时,也存在被滥用的风险,随意修改人类基因、商业化人体辅助生殖等行为,严重冲击传统生命伦理与人类社会基本道德秩序,引发深刻的社会伦理争议。

第三,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智能机器人自主决策、自动驾驶自动处置、AI 内容生成等技术应用,一旦出现侵权事故、安全问题与社会矛盾,将面临责任界定模糊、道德约束空白、监管追责困难等治理难题,形成新型科技道德监管真空。从整体治理现状来看,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科技伦理专项审查机制不完善、审查流程不规范,多数前沿科技项目重技术创新、轻伦理风险评估;同时,科研人员科技伦理常态化教育缺失,部分从业者伦理意识薄弱,重科研成果、轻道德责任;加之公众参与科技伦理监督、决策的渠道有限,社会监督力量不足,最终导致“科技向善”的核心价值理念难以落地,科技发展与道德建设失衡问题日益凸显。

(三) 新时代道德建设共性短板

除专属场域问题外,新时代道德建设存在普遍性治理困境。一是道德规范适配滞后,传统道德体系难以覆盖数字社会、前沿科技催生的新型道德问题,存在规范真空地带;二是功利主义思潮侵蚀明显,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主义、实用主义蔓延,导致部分公众公德意识、诚信意识弱化[9];三是德法衔接不够紧密,部分轻微道德失范行为缺乏刚性约束,道德软教化与法律硬规制衔接不畅;四是道德教育模式固化,重理论灌输、轻实践养成,适配新时代公众认知特征的教育体系尚未完善,教育实效性不足。

4. 新时代道德建设困境的深层成因

依据马克思主义道德社会历史性原理,新时代各类道德失范问题并非个体偶然行为,而是社会转型、技术迭代、文化冲击、治理滞后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构性结果,结合现实典型案例可具体剖析如下。

其一,社会转型催生道德范式断层。我国正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数字虚拟社会双重转型,传统熟人圈层依靠人情舆论、口碑约束形成的道德自律机制逐步瓦解,而适配数字生活、网络交往的新型道德规范尚未完全成型。例如,线下人际交往中恪守的诚信、友善准则,在网络匿名场景中逐渐弱化,短视频平台造谣抹黑、网络群聊言语攻击等失德行为频发,本质是新旧道德规范交替产生的治理空白。

其二,技术迭代与伦理建设失衡,呈现“技术先行、规则滞后”的突出矛盾。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快速落地应用,但伦理审查、监管制度更新缓慢,导致诸多现实乱象。例如各大互联网平台普遍存在大数据杀熟、个性化算法歧视问题,同一服务对不同用户定价差异明显;部分 AI 生成软件随意拼接搬运原创内容、伪造图文视频,既侵害知识产权,也违背公平诚信的道德准则,充分体现技术发展与伦理建设的脱节问题。

其三,多元文化冲击道德共识。网络开放环境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潮广泛传播,冲击崇德向善的价值体系。现实中部分网红主播为流量大肆炫富、传播奢靡价值观,部分网民片面追求个人利益,

漠视公共秩序与社会公德，公共场所随意插队、损毁公共设施、网络肆意吃瓜等行为频发，折射出部分公众道德认知模糊、价值立场偏移的问题。

其四，多元治理主体协同不足，道德建设碎片化问题显著。当前道德建设存在政府监管、平台自律、学校教育、社会监督相互协同不足的问题，缺乏常态化联动机制^[10]。例如校园侧重理论道德灌输，缺少网络道德、科技伦理的实景教育；网络平台重流量收益、轻道德治理，对低俗内容、失德行为管控流于形式；社会监督缺乏有效反馈渠道，失德行为惩戒力度不足、正向激励薄弱，最终导致道德建设落地难、成效弱。

5. 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创新实践路径

结合前文问题与成因分析，紧扣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求，立足媒体、科技两大核心场域，构建专项治理与全域统筹相结合的四维协同创新体系，破解新时代道德建设难题。

(一) 新媒体场域：构建传播创新与刚性监管协同机制

针对当前新媒体领域流量至上、虚假传播、网络失德、价值误导等现实乱象，摒弃泛化宣传模式，立足平台运营、内容传播、监管治理现实场景，构建可落地、可执行的治理机制。

一是创新轻量化的道德传播方式。贴合短视频、社交平台用户阅读习惯，摒弃生硬口号式宣传，依托抖音、B 站、微信视频号等主流平台，挖掘身边好人、基层志愿者、道德模范的真实事迹，制作短剧情、科普短片、纪实短视频等轻量化内容，以生活化、接地气的方式传播诚信、友善、敬业等共同价值，重点覆盖青少年网民群体，消解宣传的距离感。二是压实平台常态化自律管控责任。落实网络内容治理相关规定，要求各大平台建立日常巡查 + 关键词筛查 + 人工复核三重审核机制，针对虚假营销、低俗炒作、恶意抹黑等高频失德行为设置专项管控清单，对违规账号采取限流、封禁、公示惩戒等实质性处罚，杜绝平台纵容流量失德行为，从传播源头规范网络生态。同时，高强度、全覆盖的内容监管存在显著潜在风险：过度严苛的审核机制易引发“监管规避”效应，平台为规避处罚会过度收紧内容审核标准，压缩多元化、个性化的网络表达空间，扼杀自媒体创新活力与公众正常言论表达，导致网络生态趋于僵化、同质化。因此，在监管时要兼顾网络空间的创新活力。三是构建正向舆论引导与反向曝光机制。地方网信部门联合主流新媒体账号，常态化曝光网络造谣、直播乱象、网络失信等典型失德案例，形成舆论震慑；同时常态化推送文明上网、诚信处事、友善互助的正面案例^[11]，引导网民自觉规范网络言行，逐步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道德氛围。

(二) 科技领域：建立伦理前置、多元共治的科技向善体系

针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领域的现实伦理风险，立足科研立项、技术落地、行业监管全流程，构建实操性强的科技向善治理体系，杜绝空泛制度设计。

一是落实伦理前置审查，严控源头风险。针对人工智能算法、基因编辑、医疗大数据、智能推荐等高风险领域，要求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设立专职伦理审查小组，所有新技术立项、产品上线前必须完成伦理评估，重点排查隐私侵权、算法歧视、伦理越界等问题，对存在重大道德风险、损害公共利益的技术项目直接叫停，从源头规避科技失德问题。例如针对 AI 换脸、深度伪造技术，明确使用边界与授权规范，严禁用于造谣、侵权、恶意炒作等违规场景^[12]。二是普及常态化科技伦理教育。将科技伦理课程纳入计算机、人工智能、生物工程、临床医学等专业必修课，同时针对科研从业者、互联网技术人员开展年度伦理培训，结合大数据杀熟、AI 侵权、基因技术滥用等现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提升从业者的底线意识与责任意识，杜绝重技术、轻道德的行业乱象。三是搭建多方协同监管体系。由科技部门、网信部门牵头，联合学界专家、行业协会、普通网民建立科技伦理监督渠道，针对公众反馈的算法不公、隐私泄露、技术滥用等问题及时核查整改，形成“政府监管 + 行业自律 + 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

切实守住科技伦理底线。同时需明确社会监督的边界，杜绝非专业主体过度干预科研创新，避免舆论审判替代专业伦理审查，平衡社会监督的有效性与科学性。

(三) 全域统筹：搭建四维协同现代化道德治理格局

结合社会道德建设现实痛点，聚焦落地实操，构建“法治规制、教育赋能、激励约束、常态监督”四维协同治理格局，解决道德建设虚化、泛化、落地难问题。

一是深化德法融合，细化失德惩戒细则[13]。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将网络失信、商业欺诈、科研不端、公共失德等常见失范行为纳入个人、企业信用档案，针对反复出现的网络造谣、恶意网暴、虚假营销等行为，联动平台、市场监管部门实施限流、公示、行业限制等联合惩戒，以法治与制度刚性约束软性道德问题，破解失德成本过低的现实难题。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信用体系介入道德惩戒存在显著边界风险。道德问题具备主观性与情境性，若随意将各类失德行为纳入信用惩戒，易出现惩戒泛化、道德过度法治化问题，过度限制个体权益、稀释信用制度公信力。因此需严格界定适用范围，仅惩戒恶意、严重失德行为，以教育包容轻微过失，坚守法治与道德的治理边界[14]。二是优化全场景道德教育，贴合现实生活。摒弃纯理论灌输模式，中小学增设网络文明、公共道德实景课程，高校普及科技伦理、职业操守教育，社区常态化开展文明出行、诚信待人、邻里友善等基层文明实践活动，让道德教育融入校园、职场、日常生活，提升全民道德践行能力。三是完善双向激励机制，强化示范引领。各地常态化开展“身边好人”“文明市民”“诚信商户”评选，对道德模范、先进个人给予荣誉表彰、政策优惠、公益宣传等实质性奖励，发挥榜样带动作用；同时对典型失德案例公开合规公示，形成正向引导、反向约束的鲜明导向。四是建立常态化排查整改机制。网信、文明办、科技等部门定期开展网络道德、科技伦理、社会公德专项排查，针对阶段性突出的失德乱象动态优化管控措施，及时补齐治理短板，实现道德建设常态化、精准化、长效化推进[15]。

6. 结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动态发展属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维价值体系，为新时代道德建设筑牢了理论根基与价值遵循。在社会转型与数字技术迭代的双重背景下，新媒体网络失德、前沿科技伦理失范、社会公德弱化等现实问题，成为当前道德建设的核心痛点，其成因源于道德范式更迭、技术伦理失衡、多元文化冲击与治理协同缺位的多重叠加。相较于传统泛化、虚化的道德建设模式，新时代道德建设必须立足现实场景、聚焦具体问题、落地实操举措，摒弃空泛理论说教。通过优化新媒体道德传播与精准监管机制、构建全流程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搭建四维协同的全域道德治理格局，针对性破解数字时代的新型道德困境。未来，伴随数字技术持续发展，新型道德问题将不断涌现，需要持续跟进社会发展态势，动态完善道德治理举措，持续夯实社会道德根基、提升全民文明素养，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道德保障。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 李泽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设[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5(4): 75-80.
- [4] 蒋先福, 于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伦理意蕴——以德法相济的运行行为视野[J]. 伦理学研究, 2021(2): 18-23.
- [5] 郭明飞, 谷慧玲. 新媒体空间低俗化现象之样态与道德重构[J]. 河北学刊, 2020(4): 30-38.
-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北京: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4.
- [7] 韩振秋. 高科技伦理困境与突破路径[J]. 科技管理研究, 2016(12): 60-63.

-
- [8] 北京消协. 隐蔽性强, 举证困难! 北京消协发布大数据“杀熟”调查结果[EB/OL]. https://www.sohu.com/a/304158725_100013791, 2019-03-27.
- [9] 邹开亮, 刘佳明. 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困境与出路仅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考量[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8(8): 47-50.
- [10] 孙泊. 社会领域创新的道德隐忧与路径探索[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4): 14-21.
- [11] 杨园, 毛勒堂. 新时代道德治理问题的凸显及应对[J]. 现代基础教育研究, 2021, 43(3): 154-158.
- [12]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的通知[EB/OL]. <https://www.wanfangdata.com.cn/index.html>, 2023-09-20.
- [13]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EB/OL]. https://www.cac.gov.cn/2023-07/13/c_1690898327029107.htm, 2023-07-10.
- [14] 孟鹏涛. 反思与重构: 德法结合视阈下的公民道德建设问题论析[J]. 道德与文明, 2024(4): 108-117.
- [15] 肖士英. 道德他律合理性的确证与道德建设路径的创新[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4): 33-39.